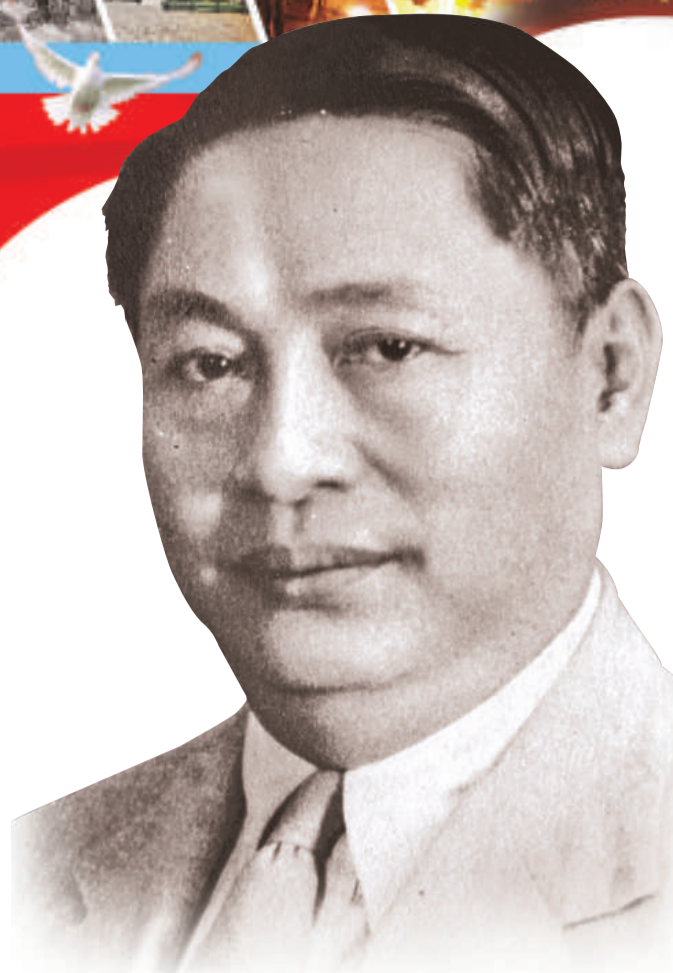


祖國不會忘記 (懷故篇)



鄭鐵如

保護人民財產典範

六十年前，中華大地經歷滄桑巨變，香江兩岸湧現出一批愛國志士，為新中國的建立傾盡力量與智慧。當時香港社會的華人領袖之一、時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的鄭鐵如，拒絕國民黨政府將現金轉移到台灣的指令，第一個帶領員工起義，為同業作出表率。六十年後今時今日，鄭先生的女兒、七十九歲的中科院院士鄭儒永，向本報記者憶述父親當年力促香港中行回歸的始末。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電】

一九一七年，中國銀行把首家境外機構設在香港，開業時選取文咸東街四十七號為行址，員工僅八人。而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的籌辦人、首任經理正是著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貽。一九二七年，貝祖貽調任上海分行經理；鄭鐵如開始成為中行香港分行的掌舵人。

一九四九年全中國即將迎來解放，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鄭鐵如精通外匯業務，此時為中行香港分行積累下大筆財富，在香港金融系統各行局中實力亦是最為雄厚。「解放前的中國銀行就是四大家族的產業，直接要求我父親轉移資產到台灣的，是他的頂頭上司、當時的中國銀行董事長孔祥熙。」鄭鐵如說。

守住香港中行資產

「我家比較早接觸到進步思想，對共產黨的看法跟當時的香港人完全不一樣。」鄭鐵如笑言。因為有當時在港從事地下工作的表哥章漢夫的緣故，鄭家經常出現印製粗糙的毛澤東著作、《西行漫記》等進步書籍。章漢夫早年留學蘇聯，抗戰勝利後曾任中共香港工委書記、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委員。港英當局因其從事秘密工作抓捕過他幾次，最後都是鄭鐵如出面找港督將他保釋出來。

解放之初，中國銀行總行在北京成立新的管理處，在接管國內中國銀行全部機構後，隨即開展與國民黨爭奪海外分支機構的鬥爭。一九五〇年初，總行管理處先後兩次通電各海外分支機構傳達「保護行產」的命令。周恩來派章漢夫專程到香港勸導鄭鐵如將資產交給人民政府，而鄭鐵如早已對積累多年高達四千多萬港元的巨額資產作出周密安排。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他即通電表示擁護人民政府，接受北京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的領導。「父親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鄭鐵如說。在中國銀行的帶動下，一月十八日，國民黨在港金融系統六行二局發表起義通電聲明保護財產，聽候人民政府接管。

有內地學者近年撰文，評價鄭鐵如當年「在護產和接收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面對國民黨台灣當局的種種威逼利誘，鄭鐵如生命危險沉着應付。」鄭鐵如表示，當年周恩來總理曾提醒鄭鐵如，小心台灣派人到香港來暗殺他。鄭鐵如一度住在香港中國銀行大廈頂樓的一間臥室和一間起居室內，白天下樓到辦公室上班，除家人誰都不能進，銀行內也增強保安。

沉着應對順利交接

鄭鐵如還記得當時由於銀行職員港人居多，交接時很多人不願意留下。鄭鐵如做了很多工作，最後他對員工表示：「不願意留，我給你們找工作，保證你們的生活。」令很多本來想走的人重新留下。而周恩來也特別關照對員工完全按照香港原來的規矩，薪水該提升的要提升，來去自由。

周恩來對鄭鐵如十分器重，中國銀行籌組董事會時，親自指定他為十三位公股董事之一。據鄭鐵如回憶，新中國成立後，每次父親來京周恩來都一定會見面並請到家裡吃飯。為避免被打擾，周恩來經常到鄭鐵如住的賓館與他會面。「每次見面都在三四個小時以上，問的都是關於外匯的事。」鄭鐵如說，總理每次都帶人來記筆記，在外匯問題上，鄭鐵如提什麼意見都會被總理採納。

鄭鐵如當時積勞成疾患有胃病，需要少食多餐，經常隨身攜帶一包梳打餅乾，這也引起周恩來的注意。周恩來特意囑咐身邊工作人員「弄清楚是什麼牌子的餅乾，『鐵老』（指鄭鐵如）來了，一定要準備好。」下一次見面時聊過一個小時，果然有工作人員為鄭鐵如端來一杯牛奶和他經常吃的那種餅乾，這讓鄭鐵如感動不已。

周恩來的知遇之恩

鄭鐵如說，總理知父親愛國心切，開國大典、國慶遊行，「這種事總理忘不了他」。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後，周恩來特別邀請鄭鐵如和夫人到京，在尚未正式對外界公布時，在中南海的小放映室內，陪同鄭鐵如觀看試爆成功的影片。鄭鐵如至今還記得父親回家後興奮的神情。

曾有人引述周恩來的話：「香港要是多幾個費彝民和鄭鐵如，我們就好辦多了。」鄭鐵如說：「父親認為總理對他是最知遇的一個人，那麼賞識他的大概也沒有第二個。」鄭鐵如亦沒有辜負周恩來的賞識，不斷為建國初期的金融及外匯政策積極建言獻策。香港金融機構由人民政府接管後，成為新中國對資本主義世界貿易的重要樞紐和吸收僑匯的橋樑，其業務量佔當時全國總額的八到九成。對中國衝破封鎖禁運，吸收存款，支援內地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鄭儒永回憶父親與周恩來總理的友情 (本報攝)

投得中銀舊廈地 成交價創下新高

說到香港的標誌性建築，由著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樓高七十層的中銀大廈肯定當仁不讓。這座形狀如「節節高升」的摩天大樓，俯瞰着東方之珠，同時也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而在充滿現代感的中銀大廈旁，古樸的中銀舊廈和門口那對石獅子一起，靜靜地守着中銀的歷史。當年正是鄭鐵如憑藉極具魄力的行動，投得中銀舊廈地皮，成交價更創下紀錄。

一九四七年四月，位於中環德輔道中的一個地段展開競投，拍賣場人頭湧湧，氣氛熱烈，連美國米高梅電影公司也想投這塊地皮來建電影院。不過，競投的焦點最後還是落在鄭鐵如和香港巨富何東兩人身上。這塊一萬四千方呎的地皮，從底價二百七十七萬八千元一直鬥到三百七十四萬五千元，何東才棄權，由中行奪標，成交價為平均每方呎二百五十一元，打破香港當時的地價紀錄；之前的紀錄為華人行舊址，每方呎價也不過五十元而已。據悉是因為鄭鐵如領導中行香港分行在外匯交易大有斬獲，所以出手才如此闊綽。

一九五〇年三月，鄭鐵如為舊中銀大廈主禮奠基，至今仍可見這塊基石上銘刻着「經理鄭壽仁立」的字樣

壽仁)。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樓高十五層的舊中銀大廈啓用；直至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九日，中銀才遷入花園道一號中銀大廈現址。



舊中銀大廈現時為中銀分行之一

鄭鐵如年表

- 1887年 出生於廣東潮陽
1915年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商科學業，進入賓州大學商學研究院學習
1917年 回國任北京大學講師及教授等
1922年 任職中國銀行汕頭、漢口等分行
1927年 轉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
1950年 率中行海外分支機構的員工起義，投歸新中國懷抱
1966年 任中國銀行董事會常務董事、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香港中國國貨公司董事長，是第一至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1973年 5月在港病逝，享年87歲

▲上世紀四十年代鄭鐵如初到香港時的留影



晚年遊京

鄭鐵如晚年到北京遊覽十三陵

發表講話

建國初期鄭鐵如在中行香港分行大會上講話



不謀私利 一心為銀行

鄭鐵如是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全國人大第一、二、三屆港澳地區代表。一九七三年五月在香港病逝，終年八十七歲。周恩來總理發來唁電說：「鄭先生不幸病逝，深為悼念。鄭先生在一九五〇年，響應黨中央和政府號召，率香港中國銀行員工起義，保護人民資財，為祖國為人民做出了有益的貢獻。二十餘年來，鄭先生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鞠躬盡瘁。特此電唁，並致慰問。」中共中央特派專機將骨灰護送至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葬，為港澳人士中第一人。鄭鐵如的長子鄭儒箴在《紀念我的父親》一文中這樣寫道：「父親幾十年經營外匯所賺得款項，歷經軍閥、日寇和國民黨保存下來，回到了人民的手中，這就圓滿地了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樁心事。」

早看重國際匯兌業

鄭儒箴在文章中提到，鄭鐵如在北大教書時就注意到，當時中國進行國際貿易所需要的國際匯兌，全部由外商銀行經營，鄭鐵如對這種現象感到痛心，認為中國的銀行應當興辦自己的國際匯兌業，不應當讓他在外商手中。鄭鐵如在中行香港分行任職期間，根據國際形勢和市場金融情況，發揮專業才能大規模進行國際匯兌，令香港分行獲得巨利，儲備金大幅增加。

為中行香港分行積累下巨額財富後，鄭鐵如很大一部分時間精力用於對付日寇和國民黨對這筆資產的覬覦。當時中行香港分行每年盈餘國民黨可以通過銀行總處提取，鄭鐵如通過呈報部分盈餘的辦法，以及將全部資金調存英美銀行的辦法應對國民黨和日寇，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銀行財產。

鄭鐵如身為當時金融業巨擘，家境卻不甚寬裕。據鄭儒永與鄭儒箴的回憶，父親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本領，只為銀行賺錢，不為自己牟利，工資是他每月的全部收入，並無「外快」。而家中九個子女的教育生活費用，亦令鄭家生活不像一般香港

「大班」家庭一樣富足。
促子女回內地工作

鄭鐵如解放前便積極投身各項愛國行動。抗戰時期末慶齡在香港組織「一碗飯」運動，為八路軍募捐棉衣。鄭鐵如家中騰出一個房間專門用來盛放製衣的布匹、棉花和成衣「堆到屋頂」，尚且年幼的鄭儒永亦被發動釘扣子。

鄭鐵如對子女的教育也十分嚴格，要求他們都要回到內地工作報效祖國，除鄭儒永的兩個哥哥因為身體原因留在家中外，其他子女只有個別人士晚年才回到香港生活。鄭儒永現為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系統真菌學家。鄭儒箴則遵父訓留學歸國效力，為錢鍾書所賞識，參與過《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工作。至上世紀八十年代過世前，鄭儒箴為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教授。



▲鄭儒永(左一)年輕時期與好友在舊中銀大廈旁留影

▼舊中銀大廈的基石至今仍銘刻着「經理鄭壽仁立」的字樣

